

★ 经典重读

1958年9月,文物出版社刊印了大字本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12月21日,为了帮助读者正确理解自己的诗词,毛泽东同志在这本书的书眉上写了十余条批注。其中对《沁园春·长沙》中“到中流击水”一句的“击水”作的注解是,“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两句诗展现的自信自强的精神风貌,贯穿着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始终。它是毛泽东诗词的鲜明特色,也是毛泽东诗词备受人们喜爱的一个原因。

—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诗词中的自信自强,有对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坚定信念,有对中国人民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力的深情礼赞。

1925年秋,毛泽东写下《沁园春·长沙》。这首词的上阕,诗人在深情描绘伟大祖国秀美山川,赞美宇宙“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无限生机之后,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残酷现实和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深刻一问,把“中国的命运应当由谁主宰”这个重大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词的下阕,诗人讲述了他在长沙求学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峥嵘岁月”里,他和师友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迈气概,用“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一语,寓意中国的命运绝不能由中外一切反动势力主宰,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

1935年10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翻越了岷山,即将取得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经历千难万险,在九死一生中终于迎来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此时的毛泽东,更加坚定了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坚定了改造旧中国的信念。回想登临岷山时远眺昆仑,诗人的想象在天地间驰骋,挥笔写下《念奴娇·昆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这首词,诗人借昆仑“夏日消溶,江河横溢”联想到深重的民族苦难,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要用“倚天抽宝剑”的力量,把昆仑裁为三截,彻底解除帝国主义对世界人民的奴役和压迫,建设一个安宁祥和的“太平世界”。

二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泽东诗词中的自信自强,有对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伟大创举的热情赞美,有对社会主义事业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

毛泽东诗词中的自信自强

■ 陆振兴

1956年5月31日至6月4日,毛泽东视察武汉。他考察了武汉工商业发展状况,听取了关于武汉长江大桥工程情况的汇报,并3次畅游长江。这次武汉之行,毛泽东为新中国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欢欣鼓舞,满怀激情地吟出《水调歌头·游泳》。在这首词中,他写下“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讴歌中国人民改天换地建设新中国的英雄豪情;写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展望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前景。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了解井冈山的建设情况,分批接见了井冈山的革命老同志、党政负责人、工人农民

等。从1927年10月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来,38年过去了,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重来故地,实现了“早想回井冈山看看”的夙愿,毛泽东触景生情写下《念奴娇·井冈山》一词,后又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等词寄予邓颖超。

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诗人写道: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首词,凝聚了诗人对38年历史巨变的深入思考。诗人坚信,只要保持和发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自信自强精神,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民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一定能像中国革命那样取得伟大胜利。

三

毛泽东诗词中的自信自强,体现着建立在人民史观基础上的人生哲学,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自信自强的精神特质。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式典礼上讲话,他指出,“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1949年9月16日,他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再次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坚信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具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力量,他的诗词也就自然洋溢着自信自强的风采,也就有了“横扫千军如卷席”“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样的经典诗句。

自信自强,是人生最宝贵的精神品质,也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在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伟大征程中,毛泽东诗词宣示的自信自强,激励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毛泽东诗词彰显的自信自强精神,对我们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同样具有重要的激励和促进作用。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赏读

“姊妹剧团”的歌声

■ 李恒昌

1940年,山东妇女救国联合总会决定组建一支以文艺形式开展妇女工作的队伍,即“姊妹剧团”。剧团成员主要活动在沂蒙山一带,经常编排一些乡土气息浓郁、百姓喜闻乐见的歌曲、舞蹈、快板、杂耍、话剧等。这些表演通俗易懂、引人入胜,深受农村群众和部队官兵的喜爱,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士气。

铁流的中篇小说《八路军唱歌》(刊载于《黄河》),通过姊妹剧团的文艺实践,进入沂蒙精神的深层肌理。作品如一把钥匙打开抗战时期沂蒙山区的精神宝库,展现了文艺作为“第二杆枪”的重要作用,以文艺笔触完成了对革命艺术本身的诗意书写,构成一幅军民共赴国难、艺术赋能革命的壮阔画卷。

沂蒙精神的核心是“水乳交融、生死与共”,这在小说中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化作一个个可触可感的生活场景与生命抉择。姊妹剧团初到火红峪时,团长张锐拒绝秋月家特意为她准备的玉米面窝窝头,坚持嚼咽掺着高粱皮的煎饼,被里头干瘪的大葱辣得泪泪横流仍说“必须放下这个山头”;指导员刘磊在春秀家,听春秀二叔提起春秀爹娘的惨死,把钱币塞进春秀二叔的口袋。这些细节生动再现了沂蒙军民“鱼水情”——共同的苦难和“你护我周全,我为你牺牲”的默契,让八路军与乡亲们成为“自己人”。

小说中,这种生死与共的情感在1942年除夕达到高潮。张锐、刘磊执行任务途经火红峪,被秋月挽留看戏。日军突袭时,她们本可隐蔽却为了掩护百姓选择主动引开敌人。腹部中刀的刘磊还怀着4个多月的身孕。张锐爬向火红峪的最后几步,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眷恋。而乡亲

们将第一碗饺子端给烈士,并形成流传至今的风俗,让牺牲有了精神回响。为防止日军破坏,村民们只得将张锐、刘磊二人葬在不起眼的地方。刘支书一边填土,一边念叨着:“先委屈你俩了,等胜利了,就给你们选个好地方,盖两座方方正正的大房子。”朴素的承诺里,有人民群众对子弟兵厚重的礼赞。

“部队有两杆枪,一是武装枪,二是文艺枪”,张锐的这句话点出了小说的重要命题。在识字率极低的沂蒙山区,文艺是打通思想壁垒的利器,是唤醒沉睡力量的惊雷。

《红缨枪》以“枪缨红似火,枪头放银光”的意象,让目不识丁的乡亲懂得“打东洋保家乡”的道理;《参加妇救会》将“几千年锁链”的压迫与“做堂堂的人”的渴望照进妇女心里。秋月跟着哼唱时“嗓子又亮又脆”,一些女人抹开了眼泪,正是思想觉醒的开始。对口快板《赶集》中,刘磊扮演的“大娘”从“命苦”的抱怨到控诉日军暴行,引得台下观众群情激昂。戏内戏外的情感共鸣,让“团结抗日”从口号变成行动。

针对封建陋习,剧团编排“大花车”戏,通过鬼子扫荡时,小脚姑娘难以转移的剧情,借剧中人物“张老汉”之口喊出“千万别再给闺女裹脚了”。从妇女放足、佃户算账到儿童团成立,文艺如春雨般渗透进社会肌理,让“解放”从政治术语变成普通人的生活实践。

小说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既是对“革命艺术工作”的记录,本身也在“艺术地表现革命”,形成艺术与革命的双重奏。

姊妹剧团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部革命文艺创作方法的生动注脚。她们“旧瓶装新酒”,将沂蒙民歌改编为

跨越时空的书信对话

■ 杨 娟 常晓军

在当代红色文学创作领域,书信体文本因其天然的私密感与对话性,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独特媒介。军旅作家丁晓平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写给志愿军女战士蒋宗英的一封信》(刊载于《湖南文学》),以跨越时空的书信对话为载体,将志愿军女战士蒋宗英短暂而光辉的生命,巧妙嵌入宏大的抗美援朝历史叙事中,为读者打开了一段被岁月尘封的英雄往事。

蒋宗英,1931年5月生于湖南澧县,从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后,1949年8月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1951年4月,她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在抢救伤员时遭遇敌机轰炸,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不满21岁。从澧水之畔的懵懂少女到鸭绿江边的无畏战士,蒋宗英曾在家里记录下众多亲历的战场细节。丁晓平则以书信体进行创作,将体裁优势与历史记忆的重构深度融合。

一方面,作家以当代书写者的身份,向长眠的蒋宗英发出跨越时空的询问,“想当年,您也是横跨澧水,从多安桥离开家乡澧县前往临澧的吧?然而,您这一去,谁也没有想到,一别成了永别。”提问式表达,是对历史与当下距离感的消解,顿时让读者置身于与革命先烈直接对话这一情境中;另一方面,作者通过对蒋宗英生前家书及个人事迹等史料的整理,形成当代与历史书写的叙事闭环。

“我知道,这是一次有意义的‘寻找’,这也是一次有意义的‘遇见’。”为了能真切触摸蒋宗英的生命轨迹,丁晓平专程奔赴长沙、益阳、常德、澧县等地查档案、寻足迹。在湖南烈士纪念馆内,他查到蒋宗英的基本信息;在常德市档案馆,他找到蒋宗英的学籍登记册;在澧县文庙,他看到

了蒋宗英曾经读书求学的地方。正如他在信中写的那样:“阅读这样的文字,阅读这样的历史……其实我也是在阅读您少年、青年的成长史。”丁晓平在寻访中细细还原蒋宗英生活的点滴细节,使蒋宗英的形象从史料走向日常;又在信件中事无巨细地向蒋宗英诉说她牺牲后身边亲人对革命道路的追随以及家乡建设的巨变,让他们看到红色精神的传承接力。

丁晓平在作品中精准捕捉蒋宗英家书的精神内核:“入党是不容易的,我还需要下最大的努力,创造入党条件,将自己的身心献给党和人民。”在给哥哥的家书中,她写下“我甘愿牺牲我的一切,甚至是头颅”。朴实的自白,语气平静却字字千钧。在抗美援朝战场,她写下“我绝对相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属于中朝人民的,属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言语之间,生动展示了在战争这一残酷底色下,战士们直面生死、积极昂扬的革命精神。

文学作品的动人之处在于通过情感的传递,让不同时代的读者形成精神共鸣。丁晓平关注蒋宗英的英雄事迹,也关注她的个体命运和情感世界,凸显个体情感的表达。“在阅读您的家书的过程中,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在我脑海中幻想过的那些激烈的战斗故事,或者富有传奇色彩的战场趣闻,抑或战火纷飞中的往事。”“我看到的是

《参加妇救会》;用“老乡亲们喜欢听的土话”写快板,让《赶集》的“一言一语都是庄稼话”;道具就地取材,独轮车裹上花布就成了“大花车”,乡亲们甚至拆下家门板来搭建戏台。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创作观,让艺术不再是阳春白雪,而成了人人可参与的大众文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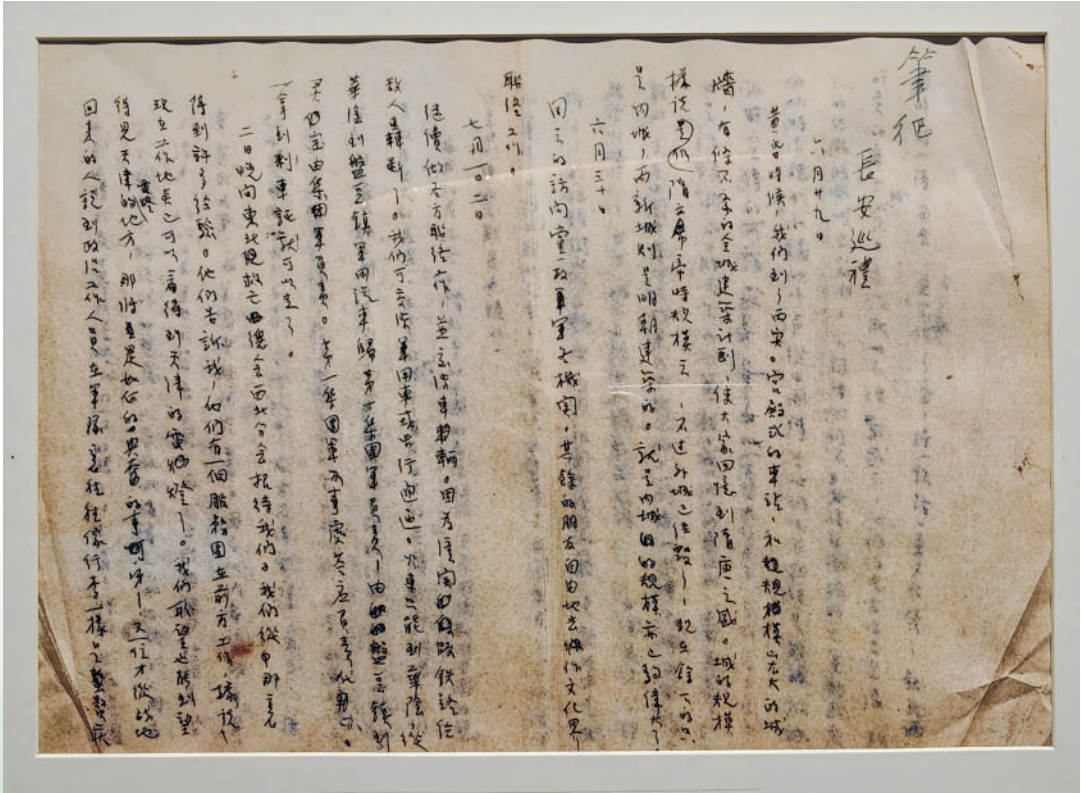
作品展现革命队伍的生动面貌和良好氛围时,既有“小不点”追着徐东插花逗乐的“活泼”,又有张锐、刘磊深夜策划演出的“严肃”;还有面对日军突袭,剧团成员分头掩护群众转移时的“紧张”。这种刚柔相济的气质,让革命队伍既有钢铁纪律,又不失人情温度。小说的叙事艺术则赋予革命历史以诗意质感。山野鲜花的意象贯穿始终,从开篇“黄缎子似的披在山坡”到结尾“各色野花覆盖坟墓”,既象征革命希望的萌发,也隐喻牺牲者的精神永生。

故事主线之外,秋月接过姊妹剧团的鼓锣,成立庄户剧团。春秀缝制的军鞋、小崩豆带领的儿童团,都是艺术火种的延续。当张股长恍惚中“看到张锐、刘磊和众多姐妹从山间走来,歌声如潮水般涌来”时,革命与艺术完成了精神接力。

《八路军唱歌》以“歌声”为线索,串联起沂蒙精神的密码与艺术表达的智慧。在那片“石头比土多”的山坳里,姊妹剧团的歌声不仅唱出了“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豪情,更唱出了“男女平等”的觉醒、“减租减息”的诉求、“团结如一人”的信念。这些歌声穿越时空,至今仍在提醒我们:革命不仅是枪林弹雨的厮杀,更是精神世界的重塑;艺术也不仅有风花雪月的吟咏,更有改变现实的力量。这或许就是作品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 视觉笔记

王礼锡《笔征日记》手稿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正式成立,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深入战地前线去“战斗”。爱国诗人王礼锡率领的作家战地访问团成为响应口号的文化团体之一。该团于1939年6月18日出发,深入晋、冀、豫、陕等地,在民众中走访,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图画等形式将敌后军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呈现出来。王礼锡不仅参与访问团写集体日记的任务,还坚持写个人日记。现存的27篇日记,具体生动地记录了他战地征途的所见所闻,留下了珍贵的抗战史料。2024年,《笔征日记》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王艾涛摄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长 征

第 6586 期

